

2009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第4辑

主编：陈志伟



内部的叙述

柳冬妩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内部的叙述

柳冬妩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内部的叙述 / 柳冬妩著.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0
(2009 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 / 陈志伟主编. 第 4 辑)
ISBN 978-7-5482-0158-8

I. ①内… II. ①柳… III. ①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①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4021 号

2009 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 (第 4 辑) · 内部的叙述

陈志伟主编

柳冬妩著

责任编辑: 于学 黄河飞

封面设计: 张丽娟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广东世汇商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60 千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0158-8

定 价: 120 元 (共 6 本)

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 650091

电话: 0871-5033244 5031071

网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编委会名单

编委会

总 顾 问：王道平 严小康
顾 问：叶泽驹 黄福泉
主 任：陈志伟
成 员：陈健秋 蔡建勋 董 红 黎寿康 黄培德
 陈志满 王海明 何环珠 周汉标

编辑部

主 编：陈志伟
副 主 编：陈健秋 蔡建勋 董 红 黎寿康 黄培德
 陈志满 王海明 何环珠
执行主编：周汉标
编 辑：胡海良 胡 磊 王润妃 刘天歌

自序

“打工”与“文学”连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场域，具有阔大的思想容量、观念张力和阐释弹性。“打工文学”是特定的社会制度、经济生活和文化活动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大环境下特有的文学现象。相对于城乡中国前所未有的各种外在的生存矛盾和内在的精神变迁，“打工文学”对它的呈现只能算冰山一角。“打工文学”的生成机制同特定的时代社会语境和丰富的文化语汇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但对于写作而言，“打工”的经历与其本身并非是压倒一切的东西，并非是文学的意义，而只是可以从中创造出意义和意味的元素，有时甚至只是背景。作为写作者，不能从题材的角度来夸大自己写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作为批评者，更不能粗暴地认定“打工文学”是对美学的贬抑。

评介“打工文学”，要从一个初始的问题开始：“打工文学”是什么？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起点。界定“打工文学”的内涵和外延，也就是确认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然后认真地观察范围内的事实，找到恰如其分的表达方式。广义上讲，“打工文学”既包括“打工作家”的文学创作，也包括一些文人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狭义上讲，“打工文学”主要是指“打工作者”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是来自底层内部的文

学叙述。从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的角度看，作品一旦完成就自成一体，有其自我成长的意识和独立的结构，不管是“打工作家”还是其它作家（包括一些所谓的著名作家），他们都应“死”得平等。疏远作者是历史事实和写作行为的真谛，“打工作家”的“亲历经验”，“著名作家”的“创作经验”，都不是阐释作品好坏的前提。但按照福柯的观点，“作者”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面对“作者之死”，福柯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作者是话语的一种作用”的观念，从而恢复了作者与文本之间微妙的联系。无论是罗兰·巴特，还是福柯，他们的观点都适用于谈论“打工文学”，告知文学世界的一种悖论式存在。根据我十几年的阅读和观察，一些“著名作家”创作的“打工文学”主要是“打工小说”（有的评论家将其命名为“底层写作”、“乡下人进城”、“农民工小说”等），与“打工作家”写作的“打工小说”平分秋色势均力敌，有时甚至“影响”更大，颠覆了作家必须“亲历生活”的原则，符合小说作为虚构艺术的要求。但在“打工诗歌”与“打工散文”写作上，“打工诗人”“打工作家”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他们重视对自身生存经验的临摹，倾心于对创作主体生存体验的复述。诗歌与散文是直接传递人类感知的文学样式。“打工作家”尝试处理的是历史语境中诗歌与个人生活的关系，也就是该怎样让自身的生存经验进入写作，并最终化为其精神底色。他们的身心与诗思同在。这就正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称的那种“一次性的生存与写作”，生存与写作在“打工作家”身上高度焊接、熔合在了一起，密榫无间。

“打工文学”这样的概念被用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作家身上时，是一种权宜之计。写作对作家来说，是一次语言和想像的个人旅行，和任何的批评概念无关。没有作家是带着标签写作的。批评家为了阐释和分析的方便，才用了“打工文学”这个无

奈的命名。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被任何命名所框定。对于“打工文学”创作，它有共同的要素，但是具体到不同的作家，对这些要素的运用和发挥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些“打工作家”之间在个性色彩、精神特质、美学趣味上的差异不一而足。一些“打工文学”作品，其差异性要超过他们的共同点，尽管这种共同点确实存在。就是对每一位作家而言，他创作风格的形成往往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其阶段性的特点也往往非常明显。在多音齐鸣、众声喧哗的时代，一些个性独具的作家往往游离于整体的、可概括的文学现象之外，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

同其它类型的文学一样，“打工文学”也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但并不缺少艺术含量较高的文本，而是我们缺少一种发现的精神，或者说缺乏发现的耐心。我想，我们不能从“纯文学”的对立面，对“打工文学”的文学性表示质疑。我们不能以“艺术”“审美”的名义随意贬低“打工文学”，歪曲与遮蔽“打工文学”的文学性。其实，“打工文学”不是因为别人的同情、怜悯、特别关照或降低门槛而进入文学领地的，而是因为它们本身就具有了文学的品质。一些优秀的“打工作家”都是“普遍意义”上的作家，而不是一个“特殊性”的作家，他与任何一种类型的作家都是平等的。他们的文学理想和目标绝不仅仅针对那个“打工”环境，而是同样指向文学本身那些永恒的艺术与审美元素。“打工文学”的写作表明，“打工作家”完全胜任于文学这一艺术样式，他们对语言的敏感和对美的信念证明了他们的创造力。“打工文学”的真正缔造者，是文学自身。所谓的艺术并不是知识精英周旋在象牙塔里的专利。

“打工文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了“纯文学”“先锋文学”等当代中国文学思潮的深刻影响，一些“打工作家”的作品也可以看作中国当代“纯文学”“先锋文学”的一个组成

部分。如“打工作家”林坚的中篇小说《别人的城市》，就发表在1990年第1期的《花城》杂志上，而《花城》那时是中国“先锋文学”的重镇。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些“打工作家”成为《人民文学》等所谓纯文学刊物的常客。一个“打工作家”并不仅仅生活在“打工”之中，生活在“此刻”，他生活在一个更大更浩瀚的世界之中，尤其是当今传媒、通讯手段的发展，使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各种不同事物、事件所组成的综合境域之中。不管什么样的文学，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共通的，彼此间的影响有一个看不见的秘密渠道。中国当代的文学思潮，“打工作家”都敏感地参与了，他们的作品都留下了“纯文学”的影响痕迹。那是他们从当代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那里得到的深刻馈赠。只是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格局之内，除了王十月、郑小琼外，打工文学的“纯文学”写作一直没有得到足够关注。“打工文学”的纯文学写作，无法轻松地纳入以市场经济机制为中心的文化体系和符号秩序。它们更像是一些边缘性的文化碎片。“打工文学”从来没有、也不曾想成为什么显赫的东西，“边缘”几乎是它与生俱来的属性。尽管如此，它还是给当代的文学世界注入了一股鲜活的血液，也从以商业利益为逻辑的强势话语当中分割出了一方文化空间，为当代文学保持了几许丰富和弹性。

“打工作家”受着当代文学思潮的影响，带来了自身的视野解放和文体意识的可贵觉醒。“打工文学”由于内容书写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文体学特点。打工文学包括“打工小说”、“打工诗歌”“打工散文”各种文体，在每一个文体的写作中，都有优异表现者塑造了自己纯粹的文学品质，拥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谱系。“打工作家”充分地意识到文学作为一种超越现实功利的精神创造现象其自身的结构方式，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他们会选择更切合表达生活、现实、想像和生存直觉的文本、文体形式。

每一种文体都有自己的特征。“打工作家”非常关心文学自身的问题，比如语言、文体、叙事等等，他们的艺术观念和审美形态的形成都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一些“打工作家”甚至以一种反叛和激进的姿态来实现自己关于文学的“有意味的形式”。多年来，我对“打工文学”的研究，也是从不同文体不同角度进行的，希望达成对“打工文学”的整体性观照与建构。本书收入了我对“打工诗歌”“打工散文”的多篇研究文章，对“打工小说”的研究只能期待来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作为我的第二本“打工文学”评论专著，本书还收进了《多重维度里的青藏书写》，是因为藏族女作家永基卓玛创作的小说《扎西的月光》与滥觞于珠三角的很多“打工小说”极为相似。

阐释与省察“打工文学”，最重要的是要关注文本话语与社会话语间的关联域。在《文学理论》中，韦勒克区分了文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前者从社会、历史、哲学、时代、种族、环境等文学的外部关系研究文学，后者对作品中的音韵、节奏、文体、意象、隐喻、象征等各个具体的构成层面和元素进行细读。与此类似，弗莱认为文学批评有“内在批评”，也有“外在批评”。“内在批评”主要是对文学结构、形式、意义和功能的审美批评，“外在批评”主要是对文学文化场域的外部考察和分析。弗莱推崇一种“系统的批评”，即“内在批评”和“外在批评”的有机结合。在《批评之路》中他强调，批评必须在文学内部培育一种历史感。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是“内在批评”和“外在批评”的统一，“我们不能把文学与一个社会中其他的话语割裂开来，在文学之外能找到文学的东西，而在文学之内也能找到非文学的东西”。巴赫金就认为文学批评寻找文学的特性只有结合特定的历史才有意义，他还认为使文学和文化联系起来是非常重要的，单纯的“内在批评”或者单

纯的“外在批评”都不可能全面地完整地揭示文学的真相。我对“打工文学”的研究，从表面上看，似乎属于“外在批评”，但实际上我一直在尽力坚守自己的艺术良知和内在的审美立场，主要体现在我对批评对象的选择上。真正有效的“外在批评”，也应该是文学的内部叙述，能使文学恢复向历史讲话的能力。题材研究要向经验研究逼近，主题研究要向审美研究兼顾。正如蒂博代在《六说文学批评》中所说：“批评的高层次的功能不是批改学生的作业，而是抛弃毫无价值的作品，理解杰作，理解其自由的创造冲动所蕴含的有朝气的、新颖的东西”。

面对“打工文学”，我不敢停留在对文本形式结构的分析上。对具体的文本研究是文学研究必要的起点，而且应该是一个开放性的起点。文本是语言的产物，也是这个世界的产物，与这个世界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我看来，“打工文学”研究必须坚持把文本分析视为不可或缺的发轫之处；但是，这些分析并非仅仅盘旋于纸面上，如同猜谜似地拆解字、词、句。我所感兴趣的文本分析必须纵深地考察字、词、句背后种种隐藏的历史冲动、心灵悸动、精神光芒或者詹姆斯所说的政治无意识。我向往自由而独立的表达，看重那些带有内心温度的文字，关心“打工文学”所呈现的心灵世界与精神处境。很多时候，我感觉到自己与所批评的对象文本形成了默契的应答关系。我非常喜欢克里玛对卡夫卡的总结：“当这个世界陷入战争狂热或革命狂热的时候，当那些自称是作家的人受感于这样的幻觉，认为历史比人更伟大、革命理想比人类生活更重要的时候，卡夫卡描绘和捍卫了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当另外一些人认为建立地上的人间天堂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卡夫卡表达了这样的担忧：人可能会失去他个人的最后凭借，失去和平和他自己一张安静的床。”我希望自己的批评之矛，能穿透坚硬的语语甲冑，有效地进入对象

文本的内部，体悟文本的内在精神状况，发现“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表达对内心丰富性的认识和尊重，向往和捍卫健全的人性，守护个体思与在的权利。

柳冬妩

2010年5月25日，东莞

目 录

自序	柳冬妩
----------	-----

身体的真相

——“打工诗歌”关于身体的另类书写	(1)
-------------------------	-------

身位与场位：“打工诗歌”的主体痛感	(43)
-------------------------	--------

身体：事件的烙印

——“打工诗歌”的身体叙事	(57)
---------------------	--------

“打工散文”：来自底层内部的身份叙述	(70)
--------------------------	--------

“打工散文”：来自底层内部的身体书写	(87)
--------------------------	--------

一种有声音的写作	(104)
----------------	---------

多重维度里的青藏书写

——《芳草》“吉祥青藏”专号阅读札记	(127)
--------------------------	---------

儿童视域里的后乡土世界

——以张绍民为例	(140)
----------------	---------

身体的真相

——“打工诗歌”关于身体的另类书写

新世纪诗歌从生命意识的觉醒到身体意识的觉醒，其间转变的轨迹是有迹可寻的。诗歌的身体性如井喷般登上当代诗歌的舞台，并诡异地表现为诗歌与身体的粗鲁却又包含着深意的美学结盟。表面上看，身体与诗歌的关系终于上到了台面上，尽管出场的方式令很多人惊愕。身体，成为诗歌的主题，诗歌的素材，诗歌的焦点。身体还顺便牵带出一大堆新鲜东西：生命力，生命的秘密，生命的本真性，原始主义，本能，潜意识，活力，自白倾向，自然，自动写作，伟大的能量，等等。在当代诗歌场域里，“身体写作”的先锋性指涉，主要来源于它对种种诗歌禁忌的突破与摧毁。但是，从第三代到下半身，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在身体的维度上可曾为诗歌的写作提供出坚实的基础？事实上，路是越走越窄，诗歌在肉身这一方面也越来越丧失一种严肃创造的精神。性的体验被空前的张扬起来，乳房、阴道、阳具等词语描绘及做爱的感知体验很自觉地被诗歌吸收，甚至达到一种泛滥的程度，进而使得诗歌更侧重诗歌的形式而非精神感知。不被灵魂指引的身体只能是欲的狂欢与灵的沉沦，行尸走肉而已。粗暴而蛮横地割裂、拒绝和悬搁任何自然、社会、文化、历史、意义的合法性，这种生理学意义上的肉身化写作并非真正的身体性写

作。蔡翔曾经提出这样的质询：“同样是‘女性’，为什么‘下岗女工’很少甚至从来没有进入过经典的‘女性文学’的书写范畴，为什么呢？所谓的身体写作也将面临同样尖锐的质询：同样是‘身体’，为什么被大火烧死的深圳原致丽玩具厂的女工们的‘身体’却得不到文学的书写？我们看到的只能是，在对‘性别’或者‘身体’的抽象的阐述中，‘阶级差别’实际上被深深地遮蔽，被遮蔽的，还有更加真实或者更加残酷的生活的一面，现实中差异性被意识形态有意无意地悄悄‘缝合’。”被此前的“身体写作”所遮蔽了的更加真实的身体，正在从“打工诗歌”中非常有力地凸显出来。“打工诗歌”是一种身体在场的写作。“打工诗歌”对身体的书写，揭示了铭刻于身体经验中的社会现实以至于历史的烙印。与当前流行的“身体写作”相比，这样的写作，更富有现实意义。“打工诗人”“不断地试图用文字把打工生活的感受写出来，它的尖锐总是那样的明亮，像烧灼着的铁一样，不断地烧烤着肉体与灵魂”（郑小琼《铁》）。“打工诗人”在生存中写作，他们深入身体的深渊，在生命的颤栗中，把它的不安、颓废、兴奋、热情转译出来，给历史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感觉表达，发现和指认了一个时代的身体真相。

他们拥有身体而且他们就是身体

“有一个和人类有关的明显而突出的事实”，特纳在《身体与社会》的开头这样说道，“他们拥有身体而且他们就是身体”。换言之，身体构成了自我的环境，它和自我不可分割。身体作为一种实存就是个体身份及其思想、观念、立场的显在化，也就是说，他并非仅仅只是指普遍层面上的身体本身。身体和主体可以互相取代，“我”即我的身体，身体并非只是一个外在的认知对象，它具有经历知觉的能力，可使万物在身体感知中彰显出潜藏

的奥秘，进而在主客体的感知中确立身体所属的人的主体性。身体的一些基本活动的方式，如睡觉、吃饭、坐立、走路、做爱、生育等等，不应该仅仅理解为是自然的，而是一系列的“身体的技巧”，这些技巧是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学习出来的。大部分身体技巧服务于一种更实用的功能，关系到一种社会秩序的需要，或者说它是一种禁止无序活动的机制。正如“打工诗人”张守刚在《排队》一诗中所写的那样：“从进厂的那天开始，她就开始排队。排队上洗手间，排队打卡，排队去上班，排队去打饭，排队领工资，然后排着队让一年过去”。身体意味着此在、真实、具体，它是物质的灵魂。当都市的中产阶级的身体被话语权力肯定而形成一种强势、主流话语之时，不少边缘的同时也是大部分的身体却淹没在沉默中。被规训在底层的身体，以及这些身体所具有的极为丰富的表征，必须被诗人所揭示、细究和穷尽。身体就是诗歌的自然界，人类的诗歌一定是通过人的身体，成为身体的一部分，成为身体的外接或者延续。

诗人林雪在《蹲着》一诗中发现“一个蓄意的，紧张的平民姿势”：

在乡村古老的槐树下，巨大的树荫像一个梦//在公路或自家的宅屋外，在田埂，场院/篱棚的出口处。在采矿者聚集的坑地里/在庄稼坡地旁//在悬挂锄头和镰刀的壁前，在天井的白光里//在建筑工地巨大塔吊的钩子下面/在脚手架的基础边。在深夜因寒冷/而无法入睡的工棚里//在向老板讨要工资而无结果后/在空旷的院落里，黑压压的兄弟们/企鵝一样蹲着//还未到来的生之空隙中//在自己的怀疑里。在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后面//雨季。大风。地球公转。太阳离开/北回归线。在由一只手/摆布的命运之中//在事物的逻辑

辑顺序中//在一切尚未开始之前。在一切已经/结束之后//
蹲着。一个蓄意的，紧张的平民姿势/被舞厅酒吧摒弃的姿
势//在磁性的大地中央站起来/蹲着的部落。带给我一半光
线/和一半阴影的我的诗歌

身体是被社会性地建构和生产的；身体被碎片化了而且有多
种多样的身份。对于“蹲着的部落”，生命的高度在他们身上还
原成了最务实的两个字——生存。诗人把目光投向磁性的大地，
投向那些真正创建历史的卑微的民众，投向那些蹲着的身体，目
光中多了一份哲学的审视和宗教的悲悯。诗人从农民工日常生活
细节里提炼出“蹲着”这一最能概括他们生存状态的动作意象，
展开富有张力的言说。这样的诗建立在直觉描述和自由想像基础
上，极富质感，剔除或悬搁了主观的抒情和对形而上的阐述。在
林雪跳跃的文字和深邃的意象中，我们分明感到一种在生命隧道
中蹲着的感觉，诗歌仿佛就是一个个视角画面的拼贴，揭示了
“事物的逻辑顺序”。诗人以平视的角度，通过“在……”的介词
短语，把卑微和破碎的生活细节组合起来，让我们看见被忽略的
身体姿势，被舞厅酒吧和中产阶级摒弃的身体姿势，向我们敞开
了一个未曾解释的边缘域。与诗人林雪相比，王夫刚对“蹲着”
有一个特写镜头：“火车就要开了，他还蹲在从候车室/到站台的
甬道中抱头而哭，他们同伴/还在冲着电话不知所措地喊着/没
了，没了，全没了/……很快火车开了，广州远了/哭声远了。暮
色中，有灯光的车厢//像一片温暖移动在祖国/从南往北的星空、
乡村和城镇”（《蹲在广州东站痛哭的返乡民工》）。面对一个蹲
着痛哭的被窃民工，一个诗人应该具备最起码的悲悯与冲动。这
也是我们的世界需要诗人的理由之一。

在工厂打工，起先/不管睡得多沉/梦中徜徉于何处/只要上班铃一响/我都会一跃而起/胡乱抹一把脸/赶往车间打卡上班/后来，因为一次差错/导致迟到和罚款/短暂的睡梦里/就总是听到铃声和打卡声/就总是不断地醒来//总想睡个踏实觉/上班时想，吃饭时想/上厕所时想，时时都想/好不容易盼到放假的一天/躺在床上，却满脑子兴奋/怎么也睡不着（刘大程《总想睡个踏实觉》）

这是一个经典的叙述，“打工诗人”刘大程抓住了一个有价值的叙述“点”——想睡而不得，得睡而睡不着。打工生活在这一个不断深入的矛盾中呈现出了残酷的一面。全诗没有一个大词，也没有一个激愤的句子，口语化叙述，朴实而稍带戏谑的平静。但其中所包含的苦难和对苦难的超越精神，却让人瞥见了诗人撼人的人格力量。在另一首关于睡觉的诗歌中，刘大程发现“一个打工妹趴在台面打盹/这是中午，流水线停止流动的间隙/她为什么不去宿舍/那里有她的一铺铁架床/我想，她一定是怕睡沉了/尖叫的电铃也无法把她吵醒//一个打工妹趴在台面打盹/在她身旁，是永远也移不平的货山/从这里经过我已留意她很久了/我与她有同一个毛病/才让闹钟提前把我叫起//一个打工妹趴在台面打盹/她打盹的姿势很疲惫/此刻她可以流水线般完成一个梦/在梦里，她回到家乡和童年/或者挣到满意的钞票，或者/遭遇美好的爱情//上帝，请让钟摆转得慢些/请把周围的噪声降到最低”《打盹的打工妹》。这是一种真实地、直接地、现场回放式的书写，诗人通过对身体睡觉场景的目击与触及，完成了对打工者生存环境的敏感体验与勘探。难怪叶芝则更加干脆地把写作视作“身体在思想”。理由很简单，诗歌创作不依赖我们自以为完备的明辨是非的判断能力。“诗歌叫我们触、尝，并且视、听世界，